

小农和荒村

香港是一个工业城市，农业是少得可怜的。

香港的工人有八十万，农民只不过几万人，还包括已经加入种植工会的小农业主和种植工人。

农民当中，以粮为主的种植者是少的，多的是从事副业的专业户，如种菜的菜农、种花的花农、养鸡的鸡农……一千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港九新界，稻田只不过十公顷，产量只不过十公吨，一年才出两万斤谷子！这是一九八三年的数字，八四年还在继续下降。如果用六百万人来分，每三百人才分到十斤谷子，不靠进口的粮食，怎么活得下去？

稻田在三十年间几乎从一万跌到十。一九五四年还有九千四百五十公顷，八三年就剩下十公顷了。稻谷在四年之间从一百跌到十，一九七九年还有一百公吨，八三年只剩下十公吨，跌了九成。

稻田萎缩，米产下降，是因为许多农民进了城，出了洋，做工去了，于是农地休耕。要不，就是专门种菜、种花、养鸡……这些比种田较能赚钱。还有一个原因是：地产商向新界发展，变农田为楼宇，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里，这是一个发展的方向。官方的公共屋村也是这样。沙田就是变乡村为

市镇的一个先锋。乡村在萎缩，城市在扩大，这就是今天的香港！

虽然种菜、种花、养鸡……香港也是还得靠外来的供应。菜和肉食，主要是靠内地；米面除了内地来的，还有东南亚以至澳洲的。花是各地都有，台湾的花有相当市场。一九七六年周总理去世时，香港有过三天瞻仰遗像的公开追悼仪式（“四人帮”也许是鞭长莫及，管不了那许多；也许是不敢犯海外之众怒，因此放宽了管制），人排长龙，花圈如潮，涌向设在中国银行大厦的礼堂。香港不像内地，没有人用纸花或塑胶花做花圈的，一个个都是鲜花缀成，主要是黄白菊花，一时之间，菊花的需要量大增。经营鲜花生意的人一得到这信息，马上向台湾大量进口菊花，空运而来（内地当时还不具备这样赶着做生意的各种条件），满足了这个需要，也满足了花商赚钱的欲求。而对台湾，特别是对和台湾接近的人，也起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影响。一时之间，传为美谈。

稻田、米产的减少，从侧面反映了工商业的发展。香港因经济上的四大支柱而兴旺发达起来，不正是六、七十年代的事么？五十年代后半期是开始，八、九十年代是继续。此盛彼衰，工商业的盛是大盛。农业上这样的沧桑就并不是值得唏嘘的事了。

休耕的农民有的就地改行做工，有的到海外去谋发展，主要是去英国。英国目前的二十万中国人中，绝大部分是去自香港的，而绝大部分中的绝大部分又是“新界仔”。新界的农民有人去英国因勤劳而致富，汇钱回来建屋，春节回来过年，这样就产生了吸引力，一引十，十引百，把许多同乡都引去了英国。不少人是在中国餐馆、外卖店打工，赚了钱就自己开外卖店、

餐馆。这时就更把家人都接了去，全家人都是店里的工作人员，都在赚钱。有个在牛津一家酒楼受薪的经理（在香港时做过一家报馆的经理）对人说，只要拿一个皮箱来英国就行了。只要肯做，不赌钱，包你几年之后就可以有存款，开店铺，买房屋。话说得也许夸张了些，但不少人的确是这样勤劳发家的，相当一部分英国华人社会中的侨领就是这样的人，这也就难怪好些新界人弃地赴英，趋之若鹜了。

休耕、移民（由乡移城，由港移英）的结果，使新界出现了一些被叫做“鬼村”的荒村，一村薜萝，几户萧疏，野草没径，人烟断绝，确实显得有几分鬼气。这些小村落的遗迹，在风吹雨打的日子，就向远足而来的本地旅行者诉说一代的废兴了。

